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若干看法[1]

裘援平

我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一直都抱有热忱，因为国家发展到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国际战略研究，探求确保国家和平发展的国际大战略。我认为北京大学有这方面的实力，也有不少社会资源。中心的每一期刊物我都认真看，相信也祝愿中心越办越好。缉思院长要我谈谈国际战略方面当前应该研究些什么课题，我想结合个人感受，谈三点粗浅的想法。

最近看到外刊上的一篇文章，提出“后8·8时代”的概念。该文章称，以8月8日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俄罗斯同格鲁吉亚发生武装冲突为标志，两个大国分别以不同方式向世界宣告：“我们回来了。”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后8·8时代”。我不想在这里评论这篇文章的观点，只想借题发挥，提示一下我们似乎也需要以奥运后或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新的历史坐标，或者说时间节点，深入研究奥运后的世界和中国，在回顾总结过去30年中国与世界关系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展望未来30年甚至更长远的中国和平发展问题。

国际战略研究要着眼于四个方面的需要。第一个是战略判断的需要，例如评估整体国际环境和机遇挑战；第二个是战略决策的需要，例如如何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第三个是战略规划的需要，例如，要有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对外工作考虑；第四个是战略对话的需要。现在，我们跟世界主要大国都建立了战略对话渠道，对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战略对话的深入，更好地增进互信、扩大共识、促进合作，特别是在思想和战略层面上影响和引导对方，都需要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包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我想粗略地谈三个方面内容来点点题：第一个是关于

裘援平　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1 本文为作者2008年9月18日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理事会上的讲话。

世界的变化；第二个是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第三是关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关于世界的变化

关于世界的变化，有五个方面的趋势和特点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关于世界的变化，有五个方面的趋势和特点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是世界格局变动加快，新兴大国群起效应突显，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在扩大。一批发展中大国快速兴起，俄罗斯的强势复出，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彰显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综合国力。这些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暂时困难局面形成一种反差，对外界的心理冲击甚至刺激作用被放大了。那么，是不是因此可以断定多极世界出现了，发展趋势明朗了？或是按萨科齐的说法，世界进入了“相对大国时代”，或者还有说“无极世界”了？基本架构究竟会是美国独霸、美欧协调、西方主导还是非西方大国挑战西方主导地位？大国关系是否将进入一个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相互适应、磨合的新时期？

还有一些影响世界格局和大国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需要观察，例如俄罗斯在战略上究竟能够走多远，是仅仅对西方通过北约东扩对其施行战略挤压做出强烈反弹，出口恶气、展示肌肉、露出牙齿而已，还是决意与美国进行战略对决、一争高下？欧美联手应对新兴大国崛起、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拉美和中东一些反美国家的联盟趋势等，会不会形成一些新的力量组合和关系架构，为世界格局的演变增添变数？对国际力量消长变化和发展趋势的判断，已不仅仅是学术性问题，而且对现实外交工作有重要意义，关乎我们能否在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及国际关系复杂变动中，处理好与各类国家的关系，纵横捭阖，争取更为主动有利的地位。

二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累积，并发几大复合型危机和严重失衡局面，全球性问题和发展领域挑战激增。从表面上看，美国继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裂后，房地产泡沫再度破裂并引发次贷危机，进而引爆金融危机，拖累全球经济。但世界经济乱象背后的深层次动因和趋势性变化更值得关注。近十余年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积累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牵动全球经济格局、分工体系、贸易关系、利益分配、国际机制、发展方式等的调整；还有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美元和非美元货币结构的调整、能源资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利益的碰撞、全球化无序发展与全球治理机制缺位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

从本质上看，当前世界经济乱象是各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累积的结果，危机处理过程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新一轮调整。金融、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气候变

化等，都是关乎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对各国发展方式和模式构成挑战。需要透过表象把握变化本质和发展趋势，趋利避害早做战略绸缪，待尘埃落定，世界经济恐怕会呈现另一番图景。

三是西方大国危机感增强，酝酿战略回应和调整，右翼保守势力推动重拾新冷战思维。我想，对“后8·8现象”的炒作和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可能会加剧欧美对新兴大国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它们对中国和俄罗斯崛起的战略关注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面向未来加紧绸缪，正处在一个战略探究和调整的阶段。有关这方面的动向，包括美国新总统上任后全球战略调整的走向，各国在奥运会后对华政策的动向等，不仅需要密切关注，而且要及时做工作，加强战略引导和施加影响。

四是全球化负面效应和国际体系弊端集中体现，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机制调整变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共同治理。面对大量全球性的新问题，现有国际机制和单个国家难以应付，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不足，某些规律性认识失效。一些大国提出各种新设想，如赖斯的“美式新现实主义”，萨科齐的“有效、和谐多边主义”，布朗的“建设全球社会”倡议等等。关于如何实施全球治理也有各种主张，像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志愿者同盟”、“依托国际组织的多边主义”、“大国共治”等等。特别要关注的是，一些右翼保守势力主张重塑西方阵营、构建“民主国家共同体”，联手应对新兴大国崛起。这是对中国和世界危害性比较大的一种思潮。

研究在这一新形势下如何趋利避害，需要对如下问题做出判断：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演变的规律和模式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格局会不会从以大国谋霸、大国对抗为核心，转向霸权的相对衰退和多元制衡的增强？传统国际力量对比和主导力量的构成会不会因为新兴国家的兴起和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而有所改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存的局面，会不会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和国际秩序转换方式，改变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零和性质，从而改变霸权国家兴替的规律和新兴大国崛起方式？

全球化带来的很多新问题都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观念和对国际关系规律的认识形成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学者能不能研究并推出一些新理念？例如，能不能针对关于大国崛起的固有偏见，破解零和规则、冷战思维、同盟对抗等理念，避免国际关系被重新拉回旧时代，同时也有利于减轻我们的战略压力？我觉得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经过30年的发展和沉淀，已经到了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更多声音，对国家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了。中国自己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是有这个能力的，中国提出的一些理念不是已经在国际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吗？

五是亚洲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变动，大国加紧对地区秩序谋篇布局，我国周边处在地区格局转换、大国战略转型、部分国家体制转轨、地区合作机制加速构建

的关键时期。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处于政治转型动荡时期，封建君主制和“强人政治”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宪政民主体制和政局不稳。亚太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地缘战略，经营周边意识普遍增强。一些国家提出了自己的战略选择。美国提出组建亚太八国集团，日本提出30年内要建“亚太网络”，澳大利亚提出2020年前要建立亚太共同体，印度在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和亚洲新安全框架等等。面对别人提出的种种亚洲地区合作发展方向和机制建设，我们应该倡导什么，推动什么，怎么构筑自己的地缘战略依托，要有自己的长远考虑。

二 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

2008年我们经历的这么多风风雨雨，是中国同世界关系转折变化、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互动的一个缩影。2008年我国遇到的国家安全挑战种类之多、影响之大、内外联动之紧密，为建国以来所罕见。抗震救灾和举办奥运，集中彰显了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为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让世界更加了解和接纳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今年的重大事件也折射出外界对我们的疑虑、恐慌、排斥等种种复杂心态，反映了各国对华政策的差异性和某些国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凸显了我们未来和平发展道路上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同时也暴露出我们自身的一些严重问题和不足。

及时反思和总结奥运会给我们的重大启示，把这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留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国际社会好评如潮，其中也不乏捧杀。对此我们确实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要认清什么变了，什么没变，防止出现某种战略幻觉或某些认识上的“泡沫化”。国运兴衰关键处只有几步，取决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重大事件上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和决策。一方面，看不到变化不行，至少要看到外界对我们的战略认知和坐标有变化，一些国家的对华战略有调整，我们对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定位更难得到广泛认同。国际社会期待我们承担的大国责任和义务会增多。不理会、不回应、不有针对性地去调整和加强有关工作，以不变应万变，显然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还得看到，我们自身的实力和内外处境并没有因为举办一次奥运会而发生根本变化，只是我们的实力和影响同外界的认知差距在拉大。如果自我膨胀、妄自尊大、不自量力，就会干扰我们实现战略目标。我们在外交和涉外安全上遇到的麻烦，主要来自三大重要矛盾：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的对立；二是中华民族复兴同霸权国家遏制企图的抗争；三是中国快速发展同其他国家利益的冲突。这是我们强国之路上难以回避的矛盾，一定要处理好、应付好。

要清醒认识我国现在的实力地位和发展阶段，认识到我们和平发展的道路绝不是坦途，一定要坚持软硬国力的均衡发展，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到大的转折关头，我们总要对国际形势包括对自己做审慎评价。我国还

处在一个大而不强、欲强还弱的时期和地位，尤其需要对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做恰如其分的估计，对如何培育和正确运用对外软硬实力，要有更深入的思考，对国际战略的类型做更审慎的研究。

同以往有所不同的是，现在是各种问题甚至是难题追着我们，仅仅跟着形势走、凭借经验干是不行的，更何况很多新的问题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在国际上往往谁先提出成套的、成熟的理论或理念，哪怕只是高明的倡议和动议，谁就可能有话语权，有引导性的影响力。这就是文明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原有的国别对外关系布局还要与领域问题相结合，才能构成更完整的外交布局。比如，经济和文化“走出去”，也就是国家利益如何向海外的进一步拓展，还有能源战略、海洋战略、涉台外交、涉藏问题等等，这类安全和发展重点领域的问题是不少的。

关于软实力的建设。今年大家感触特别深的是，民意的奋起成为中外奥运舆论战的转折点。要保护好和运用好中外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的爱国热情，使之成为我们公共外交的一个独特优势和宝贵资源。对于公共外交，要研究如何发挥各种非政府行为体、特别是智库的重要作用，以多渠道做工作应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

我们总是在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对国家而言是战略全局性的变化。怎样适应这个变化，两个大局的结合点、着力点、工作的切入点都在什么地方？抓住什么样的工作把手或者闸门就能统筹好两个大局？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几大进程中，怎样才能使国际化进程对现代化的发展起到更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三　关于基础理论研究

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加速变动调整时期，不少以往的学术性问题现实化了，基础理论研究对一线工作，包括同其他大国的战略对话都更具有重要作用。我们的研究需要聚焦，进一步整合资源，集中精力搞一些国家发展和对外工作需要的全局性、中长期和重大专题性课题的实证研究、对策研究，以及战略谋划性的研究，而这些都需要基础理论研究做支撑。现在的对外交流和战略对话需要加强思想性和理论性，需要破解一些战略和理论难题，甚至需要理论创新发展。要研究出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说明中国能够打破大国争霸的历史定律，冲破传统的观念和偏见，处理好同国际体系、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应时代潮流的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兴起的大国，没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是不行的。当前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是对全球化时代大国崛起、中国振兴、国际体系演变和国际秩序变革提出我们的规律性认识和理论观点，设法说明时代变了，中国可以打破旧

时代的历史定律，走出一条新型的、避免大国冲突的发展道路。国外战略学界及政界也有相对客观务实的有识人士，在寻找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出路，不愿意人类重蹈历史覆辙，在恶性循环的圈子里转。过去在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我们缺乏话语权、创造性和影响力，容易落在西方后边。其实，中国是一个善于运用辩证思维的国度，在世界观和战略思维方面有传统也有优势。关于当代中国、中国外交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最有发言权的是中国人自己，是我们的有识之士和专家学者，而不是国外的“中国通”。

从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梳理出很多东西，缺少的只是形成理论化的成果。现在亟需把这些规律性认识和成熟经验归纳、总结出来，上升到理论层次，使之成为中国化的外交理论成果，并有选择地把它介绍给世界。这也是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理念的一个特征是哲理性比较强，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可以借鉴的领域宽广，表述具有格言箴言的风格，言简意赅，给人以深刻启迪和重要启示。但是在理念与实践之间需要搭建起由此及彼的桥梁，这就要靠应用科学、实证研究、战略思维和可操作的政策策略筹划。

理论有三个范畴，一个是科学和哲学范畴，一个是政策和政治主张范畴，再有一个是解释性的范畴。过去国际关系学界有的人对后两种研究可能不屑，但在实际工作中，后两种研究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例如解释性研究的功效之一，在于将哲理性思考细化和转化为可资利用的智力资源，深化对外交流与对话内容，提升首脑外交效果，丰富外交实践活动。在国家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对华认知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内对外都需要大力开展公共外交。这些方面工作的重要性凸显出相关研究的重要性。北大国际战略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可以做西方大国智库的工作，引导他们客观理性地认识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促进他们形成对我国有益的认知和政策。这是很紧迫的，也是能够大有可为的。美国大选在即，欧盟也处在一个战略懵懂期。要避免西方形成联手对抗我国、冷战式的遏制战略和共识，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拿得出一套站得住和有说服力的说法。

国家发展到今天，同世界的关系已经如此紧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关联，国际这个大局在迅速增长，对国际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而现实。希望北大、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各有关方面，都能适应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全局的变化，适应国家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实现和平发展的需要，更多地支持国际问题研究，包括支持国际关系学院以及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使国际关系学科进一步发展成为重点和前沿学科，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